

精英女性的身份认同危机

——试论苏西·米勒的《初步举证》

漆梦妮

摘要 | 《初步举证》（*Prima Facie*）是澳大利亚剧作家苏西·米勒（Susie Miller）的剧本，因其深刻的主题和交叉的剧情展开方式而备受赞誉。该剧以独角戏的形式表现了一名女律师的性别觉醒，在这一过程中，她遭受了身份认同危机，并发现了法律体系中的性别偏见和漏洞，剧作由此深入探讨了结构性不平等下的性别与权力关系。该剧在情节设置和叙述技巧上，都具有饱满的戏剧张力，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和反思。

关键词 | 法律公正；《初步举证》；身份认同；性别偏见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初步举证》（*Prima Facie*）是澳大利亚剧作家苏西·米勒（Susie Miller）的剧本，因其深刻的主题和交叉的剧情展开方式而备受赞誉，2019年于悉尼首演，并在2020年澳大利亚作家协会奖上赢得了三个最高奖项，2022年引入伦敦西区后引起更大范围的轰动，2023年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剧院演出为中国首演。该剧采用独角戏的形式，讲述了一位出身寒门、毕业于名校的精英女律师泰莎的遭遇，剧中对法律公正提出质疑，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性别不平等和性侵犯问题

的复杂性。这一题材的选择与当前全球范围内对性侵问题的关注密不可分，特别是在“Me Too”运动的推动下，性侵和性别暴力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中国，近年来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公众意识的自觉，性侵案件的处理和受害者权益的保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性侵案件的举证责任和审判过程仍然充满挑战，尤其是在证明“同意”这一核心问题上。《初步举证》通过艺术化的表现形式，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正

义、权利和女性经历的深刻讨论，同时也探讨了在法律程序中的“初步举证”概念，强调了在缺乏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性侵案件中受害者所面临的挑战。本文以2022年流媒体上映的英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出版本为对象^[1]，从故事和叙述“话语”两个层面对其进行解读。

一、故事层面：从解离到重建

泰莎是《初步举证》中的核心人物，她的角色变化贯穿了整个故事，作者苏西的巧妙设置，让泰莎从辩护席走上证人席，由加害者变为受害者，角色对调的背后是泰莎782天的苦苦索求与挣扎，在对法律系统提出质疑的同时，是泰莎自我身份认同的崩塌和重组。

在讨论泰莎的身份认同危机之前，首先要说明身份的定义。身份（Identity）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如果这些理由发生了变化，社会成员的忠诚和归属就会发生变化，一些权利、责任就会被排除在行为效法之外，人们就会开始尝试新的行动规则。所有这些方面都隐含在对社会身份的认识当中，被社会成员接受、承认、效法和期待（对他人的行为形式）^[2]。身份政治涉及个人与集体的认同关系，这种关系依据个人利益与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一致性建立起来，而“认同”是从身份的不同角度对主体自身进行的一种认知和描述^[3]。斯图亚特·霍尔在《谁需要身份？》一文中提出，

身份认同是一种建构，它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化发展的，主体拥有着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可能是相互矛盾的^[4]。在剧中，泰莎的身份认同就发生了多次变化，她首先是一名雄心勃勃的精英律师。她表现出自信并且专业的姿态，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傲慢。她将辩护看作一场博弈，一场比赛，凭借熟练的提问技巧让证人放松警惕，随即抓住证词漏洞，赢得了一场场胜利，由此她感到被尊敬，并证明了实力。泰莎对自己作为律师的社会身份感到满足，她认同法律系统的运行规则，在一次次地按照行业规矩行事并取得成果后，她对此愈发深信不疑。可以说，泰莎的自尊感、成就感和归属感都与辩护律师这一身份密不可分。她轻视穿着高级面料的公司律师，认为公司律师无聊，即通过强调本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来获得本群体优于其他群体的自尊感，强化对本群体的积极评价。亚当是比泰莎更为老练专业的高级律师，在实习生表示她必须确定当事人无罪才愿意接下案件为其辩护时，泰莎通过与亚当一致反驳这一观点并一起嘲笑实习生不够专业的表现，实则强调了自我与群体中优秀的他者同一性的确认与内化而获得的认同感，而主体的认同感又不断强化着自己的身份意识，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泰莎才不断地建立并认同着自己的身份，她不再是当初那个在新生入学典礼上感到格格不入的女孩。

泰莎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她母亲的工作是打扫像泰莎现在工作的那种办公室，因此，当泰莎开学被上流社会的精英子弟围绕时，她

[1] <https://primafacie.ntlive.com/videos/>。

[2] 张静：《身份认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4页。

[3] 陈永国：《身份认同与文学的政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4] Stuart Hall.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Polity Press, 1991), p. 277.

并没有“主人翁”的感觉，而是不停幻想着有人来将她驱逐出去，她觉得这不是她该来的地方，也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打败他们成为精英中的精英。但如今泰莎成了一名光鲜成功的辩护律师，在一众精英中夺得一席之地，又得到了同行前辈的认可，这意味着她在出身、阶级和性别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占据了新的主体位置。泰莎的成功背后，是她对法律体系的执着追求和对自我价值的不断确认，由此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这样的主体性要求她面对任何案件都不要做出评价和决策，这是作为一名辩护律师的专业性的表现。也正是因为对“法律系统”和“法律直觉”的完全信任，在一次性侵案件的辩护中，泰莎尽管对证人十分同情，可辩护律师的职责只是指出证词漏洞，恻隐之心是不被允许的，她按照规则行事，帮被告顺利脱罪了。此时泰莎感到良心不安，她产生了一丝怀疑，但很快她便说服了自己。律师只负责验证证人的证词，这是正当的法律程序，最终承担责任的是陪审团而非律师，这样的法庭逻辑和证据规则在她看来是合理正确的，她只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让系统顺利运作。通过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泰莎成功摆脱了负罪感和犹豫，她成了不知情的隐形加害者。

“没有真正的真话，只有法律真理”“不要相信你的本能直觉，相信你的法律直觉”。这是新生入学时法学院学生所接受的初次教育，台上的老师不断地强调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性，因此，接受并且认可法律的绝对权威是成为一名律师的基本要求。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为了确保公正，一切要按照规则和流程进行，个人的主观判断是不必要的。当辩护律师按照规则问出了证词漏洞，陪审团便因此决定被告无罪，一切看起来是多么

合情合理。以这一整套行事规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律师身份，让泰莎非常自洽且心安地接受了性侵案件误判的可能。

然而，当泰莎自己成为性侵案件的原告时，她才发现性侵案件的情况远比她以为的要复杂得多。事情发生时，泰莎因为过度震惊导致精神解离，她不敢相信自己曾抱有浪漫幻想的对象朱利安此刻正粗暴地侵犯她。实际发生的事情与泰莎自己的主观意愿完全不符并且毫无反抗的余地，面对这种痛苦，泰莎的意识和身体分离，她感觉自己在那又不在那。在经历创伤性事件时，强烈的刺激往往使人难以承受，“人就会通过区隔化来分割无法管理、相互冲突的认知模式，这就涉及解离”^[1]。此外，解离还伴随着情感和身体的麻醉，表现为虚幻感、混沌感^[2]，在明知道事情发生后应该留证的情况下，泰莎还是选择立刻洗澡并打扫房间，收到朱利安的短信下意识就按了删除键，她没办法控制自己，这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处于混沌状态下她做不出最理智、最有利于取证的决定。而这种解离此后也仍在发生，创伤带来的伤害是深刻持久的，因为遭受性侵犯给泰莎带来的伤害并不只是单纯的身体上受到的粗暴对待，她的自我认同面临着重大危机。

作为一个人，泰莎的个人意愿不被尊重，她失去了主体性和自主权，失去了自我和安全感。作为一名曾经的辩护律师如今的证人，面对性侵案不公正的判决结果，泰莎感觉到背叛，她一直坚信法律可以保护每一个人，认为法律能够带来正义和公平，然而当自己无法置身事外时，她才

[1] 利奈特·S.丹尼恰克：《创伤与解离——创伤如何使我们成为另一个人》，人民邮电出版社，2023，第1页。

[2] 茆云璐：《创伤记忆在动画中的表达方式研究》，中国传媒大学，2023。

发现这其中的漏洞和偏见，她失去了对法律的信念。出于对审判流程的了解，她知道自己上诉一定会失败，这时她意识到，从前自己确信能够维护人权的法律程序，并没能真正确保审判的公正性。泰莎终于开始质疑这么多年全然信任的系统，而以此为核心建立起的引以为傲的精英律师身份也摇摇欲坠，她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是一名帮凶。

泰莎的成功背后，是她对法律体系的执着追求和对自我价值的不断确认，然而，当她成为受害者时，这些努力和追求在辩方律师的推测下都变得毫无意义。在男性主导的职场中，女性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认可，但辩方律师不无恶意地揣测女人把性当作自己的工具去谋求事业上的成功，认为泰莎故意起诉朱利安只是为了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不仅贬低了泰莎的人格，否认了她的专业性，也无视了她辗转了782天的痛苦。

泰莎的反思不仅体现在她对法律制度的质疑上，还体现在她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识上。她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律师或受害者，而是一个具有复杂情感和丰富内心世界的女性，她发现了被压制在“法律真实”之下的活生生的受害者的痛苦经历。她开始意识到作为一名女性在法庭上所感受到的孤独和无助，法官、律师、警察甚至书记员都是男性，泰莎只有时不时看看母亲和年轻的警员小姐才能获得些许安慰。过去站在辩护席时，她坚信每个人只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便能实现公平正义，而证人的证词必须是简洁准确，富有逻辑的。易地而处，在反复不断地用自己的辩护技巧质疑自己的亲身经历之后，她发现了法律体系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和举证责任的不公平分配，靠抓住证词漏洞维护的“法律真实”并不能在性侵这种会造成受害者创伤应激反应的特殊事件中保

证绝对的正义，女性的受害经历与由男性主导制定的法律系统不符，因此在明知必然失败的情况下，泰莎依然选择站出来，不只是为自己发声，更是为所有受害女性争取权益，让她们被正视、被听见，让未来不幸走上证人席的受害者拥有得到公允判决的可能。

泰莎从笃信法律运行规则并将辩护看作一场游戏的精英律师，到被游戏规则反噬的受害者，在灵魂最深处都是那个勇敢、聪明、追求正义的利物浦女孩。在挣扎了782天后，最终成了一个不卑不亢地呼唤着正义的泰莎，穿着母亲送的亮粉色纯聚酯纤维衬衫并依然相信充满缺陷的法律系统的泰莎，尽管崩溃但绝不保持缄默的泰莎。

二、话语层面：身份建构与权力关系

在叙事学中，“话语”指的是叙事作品中的技巧层面，即表达故事的方式，如叙述层次和类型、叙事视角、时间安排等^[1]。《初步举证》采用多线穿插叙事的手法，通过女主角泰莎的经历展开故事。在故事的发展中能看到泰莎的身份转变，特定并且多次重复的句式展现出泰莎主体性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而在泰莎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下隐藏的是性别与权力关系。

首先，作者苏西·米勒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让辩护律师成为证人，一方面，剧本展示了泰莎如何在法庭上进行精彩的交叉审问，如何走出中产家庭成为一名精英辩护律师；另一方面，剧情突然转向泰莎本人成为性侵受害者，这种突然的转变不仅增加了戏剧张力，也使泰

[1] 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莎对法律体系的质疑和对正义的呼唤更加振聋发聩，从而更好地发挥戏剧的社会影响力。

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泰莎辩护律师的身份逐渐让渡给遭受侵犯的受害者。第一幕一开始泰莎就表演了一场精彩的辩护，结束后回家探亲，这是角色的初次亮相，展现出一个雄辩自信的律师形象，也介绍了泰莎的成长背景。随后插叙一段大学第一天的开学典礼，比起周围出生优越的同学，泰莎像一个局外人，她因无所适从感到焦虑，然而这也意味着当她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顺利毕业并成为律师，取得了本以为不可能实现的成功时，她的所有成就感和认同感都将与这一身份密不可分。剧作者让泰莎在事业上感到如鱼得水，在受到质疑时她总会强调律师的职责并非做出评判，她通过反复陈述和实际的经验反馈不断地建构并强化着身为辩护律师的自我认同。

在泰莎回忆起曾经的一位性侵案件的受害人之后，快速的语言流动和角色切换暗示着泰莎不能给自己时间太深入地讨论这些性侵案件中女性的经历，她有些许愧疚但很快又被自己说服，这是她在由男性律师、法官和陪审团主导的世界里下意识形成的应对机制。然而很快，剧作家让泰莎自己成了受害者，还将她推上了性侵犯案件中最难以自证的处境：泰莎与朱利安曾有过一次性行为，公司同事爱丽丝和泰莎的朋友米娅都知道两人相处暧昧并且泰莎表现出对朱利安的好感，在泰莎受到侵犯当天的前半夜她和朱利安之间都是颇为正常的约会情形。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必输的境地下，才会激发泰莎对法律系统产生怀疑，她经常不无骄傲地说要测试法律，但这一次的结果，没办法再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了，由男性主导的法律系统，在面对以女性受害者居多的性侵案件中，出现了漏洞。

不管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戏剧效果，还是出于

米勒本人的多年从法经验，剧本选择一位律师来扮演性侵案受害者都是值得深思的。它告诉观众，即便是如此专业、雄辩的从法人士，一位在胆识、专业知识、法律意识各方面都无可挑剔的女性，在如此冰冷的法律体系面前，尚且需要克服万重困难，走得异常艰辛，去质疑自己是否过于敏感小题大做、去鞭答自己的身体、拷问自己的记忆，去一次又一次重访那个深渊，去揭开伤疤，让最私密的痛苦公之于众，甚至在亲人和朋友面前展现自己最为不堪的一面。这条路对她来说已经如此艰难，更别说其他千千万万或许连字也不识的受害者了。

泰莎的身份危机揭露的不仅是法律的漏洞，其中也暗含着对性别与权力关系的讨论。在此前的性侵案件中，作为让系统运行的齿轮之一的泰莎，与由男性主导的法律体系站在同一阵营，对于真实地受到了伤害的证人来说，泰莎无异于一名加害者。然而，结构性不平等的狡猾之处就在于，它巧妙地伪装成一种“自然秩序”，即使看似“顺应局势”并侥幸成了一时的获利者，甚至成了女性之中那个看似强大、看似获得了平等对待的存在，但是，一旦触及那些深层次的、性别权力结构核心问题时，仍然会发现自己同样脆弱，发现自己被信奉的系统和群体抛弃，之前的所谓“强大”像肥皂泡一样虚幻可笑。在父权制的阴影之下，当所有规则、法律、社会规范都由男性决定、女性的声音和权利不被正视的时候，枷锁始终毫不留情地加诸每一位女性。也正因如此，泰莎的发声是意义非凡的。

从走进法庭起泰莎开始反复地用“这便是我”（this is me）的句式，通过这样的话语试图重建自己的主体性，是泰莎对自己的鼓舞和肯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剧本在表现辩方律师的质询时，一开始只有泰莎的回答，而不是辩护

律师向她提出的问题，在这一刻，她暂时失去了作为叙述者的能力，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但泰莎并不会坐以待毙，在辩方律师表示她诬陷朱利安是为了去更大的事务所时，泰莎重新掌握对自己故事的叙述权，她可以接受朱利安背后说与她之间只是玩玩，但当自己的人格和专业能力被污蔑时，泰莎的回答变得坚定而果断。在后续的陈述中可以发现，泰莎并没有完全失去对法律的信心，她认为法律是有机的系统，它是由人的经验来定义的，而这一信任也正是泰莎选择发声的前提，这是泰莎作为一名女性和律师而发出的全新的声音。

三、余论

《初步举证》以独角戏的形式表现了一名女律师的性别觉醒，在这一过程中，她遭受了身份认同危机，并发现了法律体系中的性别偏见和漏

洞，不管是在情节设置还是叙述技巧上，都具有饱满的戏剧张力，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和反思。在剧本之外，就本文参考的演出版本而言，镜头在泰莎最后的陈述时拉远，将台下的观众也拍摄进来，这一手法不仅增强了剧作的感染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演出与现实之间的壁垒，让观众意识到自己不仅是旁观者，改变不应仅限于舞台之上，而应延伸至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强调了所有人对法律公正和性别偏见问题的共同责任。因此，《初步举证》不仅是一部富有张力的戏剧，更是一种对社会公正的呼唤，正如泰莎所说，有些“改变必须发生”。

[漆梦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